

我国编辑的起源及其在历史上的贡献

· 邓国英 ·

我国编辑的历史已有几千年。“编辑”一词最早见于唐初史学家李延寿撰写的《南史·刘苞传》，传中说刘苞“少好学，能属文，家有旧书，手自编辑，筐篋盈满”。这里，“编辑”除校补旧书的正误脱落漏补，还有整理顺序的意思，含义较广，尚未形成一种专用名词。宋太宗雍熙三年（公元986年），翰林学士宋白上《文苑英华》，上览而善之，诏答曰：近代以来，斯文浸威盛，虽述作甚多，而妍媸不辨。遂令编辑，上取菁华”。这里所说的“编辑”则与近代的编辑工作的专用术语已是同一含义——“搜集材料，整理成书”了。我国的编辑活动，实际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，那时就有搜集材料，整理最早的书籍——简册的编辑工作。

在我国，编辑工作者在历史上作出过极其重要的贡献。汉成帝时，由于“百年之间，书集如山”，但当时版本很乱，成帝为整理宫中藏书，统一版本，便任命了几位校书，由刘尚（公元前77年～公元前6年）总管（相当于现在的总编），按照图书的内容和性质分成6组对宫中藏书进行整理。汉代以后，由皇帝下令编辑书籍至为繁盛，如宋朝，仅太宗就下令编纂了3部著名书籍：

《太平广记》500卷、目录10卷，采摭宏富，用书至344种，还有《太平御览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。明朝永乐年间，由解缙主持编辑的《永乐大典》，编辑机构设置（总编辑）3人、副总裁（副总编辑）25人，编辑343人，参与编校、录写、圈点的儒臣、文士、学者、手书2169人。《永乐大典》这部卷帙浩繁，编入各类图书七八千种，上自天文，下至地理，从诸子百家到历史典制，从戏剧、平话到医药、工技、农艺、僧道以及其他各类著作，无所不包，内容广博，共有22877卷，还有凡例和目录60卷，计11095册，总字数约3.7亿，相当于我国现今编纂的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的4倍。《永乐大典》在校勘古籍版本以及搜集已经失传的典籍方面，有极其重要的贡献。到了清代，编书规模更大。乾隆下诏任命纪筠、陆锡熊、孙士毅为总纂官，集中300多位学者做编辑工作，编纂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一部超大型丛书——《四库全书》。《四库全书》工程浩瀚，整理细致，共收书3400余种，约79300卷，36000册。《四库全书》编成后，共誊抄7部，每部6700余函，229万叶。另有《四库全书荟要》2部，仅此抄书一项就费时10年，花银400万两，前后手书者达3826人。《四库全书》的编辑出版对整理延续我国古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，也说明编辑在文化产生与传播中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。

我国古代编辑家不仅对繁荣古代学术事业，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增加了巨大财富，而且对古代编辑事业也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在这里，孔子在中国编辑史上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，他赞《周易》，修《春秋》，删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对保存和传播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他的“述而不作”、“书其重者”、“垂世立教”的编辑思想是中国编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愧为我国历史上的大编辑家。在古代编辑事业中，子承父业，编辑成就突出的，还有刘歆（公元前50年～公元前23年），他是刘尚的儿子，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古文经学家、目录学家。他继承其父历经19年艰苦工作而未竟的事业，编辑了一部目录学开山著作《七略》。《七略》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图书分类法，它奠定了我国图书目录学的基础，对后来的编目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在近代，自鸦片战争以后，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开始传入我国。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纷纷著书立说、创办期刊、编译丛书，或介绍西方，传播西方知识，或探求强国御侮、振兴中华之路。我国编辑事业开始步入一个多姿多彩的新阶段，而开创我国近代编辑事业新篇章者，首推进步思想家魏源。他在公元1842年编辑的《海国图志》是中国近代最早、最辉煌的编辑成果。这部50卷的巨著（公元1852年扩充为100卷，附地图73幅），全面介绍了世界各地民俗，主张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、“变古革新”，书中表现的历史

提高辞书质量之我见

· 李尔钢 ·

辞书作为自学和科研的必要工具,历来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,被称为“无声的教师”、“没有围墙的大学”。建国以来,特别是十年动乱之后,我国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辞书,如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修订本、《新华字典》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、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、《汉语大字典》、《汉语大词典》、《英汉大词典》等等,大都千锤百炼、精雕细刻,以其高质量赢得了高声誉和高效益,在我国出版界掀起持续升温的辞书热。这股热潮带动了各种中小型辞书纷纷涌现,为满足各种专业、各个层次读者的不同需要作出了贡献。

但是,辞书的持续升温也产生了负面效应,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其一,许多不是辞书、不具备

辞书特性的图书也以辞书名义出版;其二,许多优秀辞书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抄袭,侵权现象严重;其三,粗制滥造,差错成风。一个突出的例子,就是辞书学界目前正在展开批评的王同亿《语言大典》、《新现代汉语辞典》等书。这些辞典中,经查证核实的删窃条目达65%以上,有的胡编乱造,从编纂思想、立目标标准到释义举例漏洞百出,被称为“谬误大全”。这些所谓辞书的出版,扰乱了视听,冲击了市场,也影响了辞书的声誉。读者开始用疑虑的眼光看待货架上林林总总的辞书,严肃的、精编精审的辞书的销路也受到影响,辞书热开始降温,违背市场规律的粗制滥造受到了市场的惩罚。

当前,整个出版界正面临着从总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移,对于辞书出版来说,压缩品种,提

进化观点与要求变革的思想,不仅对中国近代思想有重大影响,也受到日本维新志士的推崇。

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,为适应传播信息的需要,科技期刊在我国诞生了,在编辑史上又增添了新的一页。公元1876年创办的我国最早的科技期刊《格致汇编》,主持人兼编辑徐寿除了把西方的化学、物理学、医学、工程技术、矿物学等通过《格致汇编》介绍给我国读者外,还亲自撰写《医学论》、《汽机命名说》等科技论文及一些科技报道,并编译出版了《化学鉴源》、《化学考察》等西方化学著作,为奠定我国化学学科基础,促进我国化学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

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代表的近代新式图书馆的创立,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使用和推广,把我国近代编辑事业又推向一个新阶段。这些印书馆除编辑出版大批书刊外,还造就和培养了一代代编辑人才。张元济(公元1867~1959年)在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,参与规划《最新教科书》,影印出版《四部丛

刊》、《续古逸丛书》、百衲本《二十四史》3种丛书,共610种,近2万卷。陆费逵(公元1886~1941年)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,在他主持下,中华书局先后编辑出版了《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》、《中华大字典》、《辞典》和《四部备要》等大部头著作和几百种教科书,创办了几十种报刊。

我国目前拥有编辑近10万,1993年全国共出版图书96761种,59.34亿册(张);杂志7011种,23.51亿册;报纸1788种,总印数263.83亿份。除了那些撰著者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劳动之外,10万“苦恨年年压金线,为他人作嫁衣裳”的编辑工作者,在默默无闻的工作中洒下的劳动汗水,为构筑我国灿烂的文化宝库所起的作用也是巨大的。正是10万编辑工作者的无私奉献,才使文化遗产得以继承和发扬,使学术思想得以开拓和繁荣,使科学技术得以传播和发展,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得以进步和兴旺,使大批人才得以发现和扶植。

(作者单位:《武汉大学学报》编辑部)